

当前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着力点^{*}

胡家勇 武 鹏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存在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它具有促进社会公平的效应,但这一点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发挥它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作用,在当前条件下,需要抓住三个着力点和重要环节:合理提取和配置国有企业红利,防止国有资本收益内部化、私有化,将更多的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用之于民;提高国有资本及其收益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力度,着力构建社会安全网;合理处置国有土地出让收益,满足保障房建设等民生项目的资金需求。

关键词:公有制 共同富裕 着力点

一、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社会责任与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在促进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测算,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间和行业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之时,我国的地区差距在窄幅波动中趋向下降,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由2003年峰值时的0.2757下降到2010年的0.2267,降幅达17.8%(武鹏,2012)。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有企业的贡献,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

自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面对中央出台的多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国有企业参与其中,收到了良好的区域均衡发展效果。例如,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部分建设投资。2010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西部地区的40%,显著高于27%的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之后,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加大了参与民族地区建设的力度,预计“十二五”期间在新疆的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对新疆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将超过70%(郑晓波,2011)。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践表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实施过

程中,基于公有制经济的资源调控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表现明显。

但是,在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却往往遭受诟病。例如,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往往获取了过高的收入,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铺张浪费现象严重,树立了不良的社会形象;国有企业的收益并未充分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等。实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发挥它们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功能。目前重点需要抓住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1. 合理提取和配置国有企业利润,将更多的国有资本收益用之于民。国有企业红利作为国有资本收益,是国有资本所有权的重要体现,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收取和管理的重要社会财富,理应合理提取、用之于民。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历史负担亟需梳理和克服,该制度自1994年予以暂停,直至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后才重告恢复。此后,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数额和比例逐年增加。但即便如此,目前的上缴比例仍显过低。2010

^{*} 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jyhu@cass.org.cn;武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wuzuopeng831228@163.com。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项目”资助。

年,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 8490 亿元,共上缴红利 788 亿元,尚不到净利润总额的 10%。^①若考虑到大部分尚未列入征缴范围的部分和地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将更低。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 30% 到 40%,而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如英国盈利较好的国有企业上缴的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 70% 至 80%。而自 2007 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我国中央企业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和垄断行业,也仅仅只有税后利润的 10%。即使 2011 年后将上限提高到 15%,也仍不及国际通行水平的一半。除了未能实现“合理提取”外,国有企业红利在支出使用方面,也未能充分实现“用之于民”。如在已上缴红利中,用于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和补充社保基金的部分只有 90 亿元,仅占红利总额的 11.4%。^②

尽管在国有资本红利征收和使用的具体方式上有所差别,但提取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并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和改善民生,在很多国家已形成了一套系统性通行规则。未来,我国应当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彰显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人民的所有制本质。参照发达国家的相关成熟经验,最终达到的合理缴纳比例应为 50% 左右。其中,资源性和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还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在红利的使用方面,应加强对民生方面的投入,除了用于民生性公共支出和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外,还应拓展到扶贫、助学等再分配支出领域,以缩小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逐渐实现人的基本发展机会的公平。

2. 强化对国有企业收益流向的监管,防止国有资本收益内部化、私有化。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高管和员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诟病和不满,甚至有的国有企业在亏损的同时,仍旧派发高额的工资和福利。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国有资本的收益内部化、私有化。例如,2010 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 1.13 万亿元,其中,公积金等留存收益约占 25%,红利上缴仅占 7%。^③据测算,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行业,工资水平高出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 1/4,引致行业收入差距上升约 25% (武鹏,2011)。这意味着,部分公有经济不仅未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明显背道而驰,也有违公有制的本质属性。

除了工资福利超发外,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过度消费行为也较为突出,不时有“天价茅台”、“办公楼奢华装修”等事件曝光,大量国有资本收益被恣意挥霍。M. Jensen & W. Meckling (1976)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开创伊始就已指出,企业管理人员会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利,对可以提高自身利益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扩张企业规模、修建豪华办公室和购置高级办公设备等。由于所有者缺位问题尚没得到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代理”困境较之其他所有制企业更为严峻,如果没有更加严格的制度化监管,资产流失、收益浪费等问题将难以得到较好的治理。

一些典型的高收入国有垄断企业在超发工资和福利的同时,还在向政府申请巨额补贴,变相索回已上缴的红利。例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垄断石油企业每年均向中央财政要求上百亿元的补贴,远超过所上缴的红利数额。以 2008 年的中石化为例,共获得了 503 亿元财政补贴,而其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利润仅为 297.69 亿元,按 10% 国有红利上缴比例计算,上缴数额不到 30 亿元,远远低于国家财政补贴的规模。

综合上述问题,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监督审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力成本控制标准和薪酬标准,并将这些标准纳入对企业经营者的考评,与其升迁奖惩相挂钩。就寡头垄断行业而言,虽然寡头企业之间很容易实现合谋以攫取更多的垄断收益,但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在升迁的道路上存在竞争关系,这会抑制它们之间的合谋行为。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可以采用“标尺竞争”的方式来解决监管者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而要控制低效率的过度投资、降低铺张浪费等代理成本,则应限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可支配的现金数量 (S. J. Grossman & O. D. Hart, 1980; M. Jensen, 1986)。对此,分派红利和提高分红比例是一个有效易行的措施 (R. S. Hansen, R. Kumar & D. K. Shome, 1994)。政府补贴则必须与行业劳动报酬水平相挂钩,对职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垄断企业,政府补贴应更加谨慎,以免政府补贴最终转化成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这不仅不能达到补贴的初衷,还会恶化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对于确实有正当申请理由的,政府应密切跟踪审计补贴的使用情况,谨防其被垄断企业内化成自身收益。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方面可以抑制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可供上缴的红利,以资助民生

支出。

3. 国有企业应切实肩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注重实现社会效益。很多国有企业的经营业务具有公益性质,这在中央企业层面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企业层面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领域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经济效益自然是其目标之一。但与此同时,由于国有资本的属性,国有企业还应注意社会效益的创造,肩负起高质高量地满足民生需求的责任。

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效益创造方面尚有较大的差距。如国有电信企业长期获取巨额垄断收益,但通信资费远高于发达国家,宽带网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最大的 CDN 服务商美国 Akamai 公司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布的 2011 年全球网速数据显示,平均网络连接速度最快的国家或地区是韩国,中国香港、日本分居二、三名,中国大陆仅排在第 90 名。在“网速低于 256Kbps 的慢速互联网用户比例”的比较中,中国大陆的表现仅优于印度,位列全球“第二慢”。另有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指出,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使用的是“假宽带”,即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中国大陆网民实际每月为 1Mbps 宽带的支出是越南的 3 倍,美国的 4 倍,韩国的 29 倍,中国香港的 469 倍。再如成品油价格问题,当国际油价上涨时,国有石化企业积极推动国内成品油提价,而当国际油价下降时,它们则拖延乃至阻挠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地下调。2010 年 10 月 9 日后,为抵制发改委下调汽柴油价格,中石油、中石化甚至采取了限量供给柴油、人为制造油荒的行动,导致物流运输的部分瘫痪和城市物价的较快上涨,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国有公益性企业,尤其是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财务收支不透明,极易出现隐瞒谎报实际经营支出、抬高名义经营成本的问题,由此所产生的公共品和服务价格虚高,严重侵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如 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广州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对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度的供水成本进行了监审。在这份“监审清单”中,一立方水被企业多报成本 0.348 元,比真实成本 2.016 元“虚高”了 17.26%。期间,为改善水

源,广州实施了西江引水工程,由于项目建设成本超支,广州自来水公司意欲调高水价。该项目总投资 79.7 亿元中政府投入的 17.3 亿元被计入了定价成本,而按成本监审规定是不应计入的。此外,还有诸如吃喝等业务招待费用多报了 449 万元,虚报管网漏损率增列成本 3168 万元等账目问题。但就在广州自来水公司自身违规、粗放、欺诈性经营已昭然若揭的情况下,其供水范围内的水费仍由 1.32 元/立方米上涨到 1.98 元/立方米,广州市民自此将多支付 50% 的水费。^④诸如一边声称经营亏损、一边发放高额工资和福利的现象,在电力等其他公益性垄断国有企业也多有存在。

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强化对公益性国有企业社会效益的考核,使得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够普遍享受到国有资产所带来的廉价便利的通信、水电等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面应增强公益性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透明度,晒出他们的“业务账单”供社会、群众评判,抑制其侵害群众权益、变相侵夺公众财富的行为。

二、国有经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共同富裕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以国际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城镇与农村人口养老和医疗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低保”和社会救助等。但现有的社会保障网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和社会保障权利大规模流动等挑战。建立一个包容性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急切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把农村居民、农民工、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者都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经济群体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只占其总数的 1/4。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解决社会保障网碎片化问题,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三是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偿还社会保障的历史欠账,做实个人账户“空账”。据世界银行粗略估计,我国养老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于 2008 年 GDP 的 82%—130%(The World Bank, 2012)。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应对以上挑战,构建一张可靠的社会安全网,需要向社会保障体系注入大量资本和现金流,在这方面,国有经济基于自身性质,应该有所作为,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2009 年我国启动了“减持”、“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工作,^⑤到 2011 年底,全国社保基金累计转持境内国有股 1036.22 亿元,其中股票 813.44 亿元,现金 222.78 亿元;2005 年执行境外国有股“减持改转持”政策,至 2011 年底,全国社保基金累计转持境外国有股 542.79 亿元。^⑥截至 2011 年底,中央财政性资金累计拨入社保基金的 4920 亿元中,其中源于国有股减转持的收入占 43.1%,金额达 2119 亿元。^⑦在上述举措的推动之下,我国社保基金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满足了支出规模加速扩张的资金需求,推进了社会保障项目的“全覆盖”进程。2012 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 30379 万人、53589 万人、15225 万人、18993 万人和 15445 万人,比 2011 年分别增长了 7.0%、13.2%、6.3%、7.3% 和 11.2%。^⑧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多年统一调整,由 2000 年的月人均 544 元提高到 2011 年调整后的 1511 元,6000 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做到了按时足额发放。2011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中统筹基金次均支付 6112 元,比上年增长 8.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中基金次均支付 2891 元,比上年增长 10.7%。“低保”标准和失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多次提高。^⑨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历史欠账较多、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将社会保障提高到现有水平,是难能可贵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还应看到,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待遇水平的提高,资金筹措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提交给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 2013 年全国社保基金预算报告显示,2013 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增速为 9.9%,而支出增速为 16.8%,两者相差近 7 个百分点,以致 2013 年全国社保基金收支结余与 2012 年相比将下降 1000 亿元。依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尤其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快速到来,社保资金缺口的潜在隐患很快

就会凸显出来。国有经济对社保基金的支持力度必须相应加大。

从理论上讲,利用国有资本及其收益填补社保资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账”,是一种对以往隐性负债的合理偿付,而不应简单理解为让国有资本替政府“埋单”。计划经济时期,个人收入分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分配,在个人收入分配之前,就已经扣除了“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等社会保障支出部分。^⑩政府作了相应的扣除,就应该承担起相关劳动者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义务。在实际经济循环中,对劳动者收入所作的社会保障“扣除”形成了国有资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传统体制下重积累、轻消费的工业化模式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得国家对当时的劳动者形成了庞大的隐性负债。一方面,城镇职工的工资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上,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用于生产性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所创造的相当一部分价值被转移到了工业和城市,最终形成了生产性积累。可见,目前庞大的国有资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期以来城乡劳动者个人收入在社会保障方面所作的“扣除”、低工资下城镇职工的“剩余劳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转移的农产品价值积淀滚动而来的。这些劳动者在进入养老阶段享受由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提供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金,事实上也是在享用自己工作时为国家和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可见,将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用于补充社保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正常路径循环。并且,目前国有股“转减持”和国有企业红利拨付的力度还远未达到过去的“扣除”和“转移”水平。

因此,无论是从国有资本性质,还是从契约公平的角度出发,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补充社保资金的力度都应继续加大。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也确实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在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财政部《关于 201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为 929.79 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为 50 亿元,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支出 17.21 亿元,二者合计仅占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 7.23%。而 2013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社保基金进一步降低为 11.34 亿元,较 2012

年降低了近35%。着眼当下,虽然全国整体性的社保支付困难尚未到来,但在个别省份,特别是历史负担较重的东北三省,社保资金吃紧的现象时有显现。对此,应该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通过向社保基金增拨国有股,变现国有股(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股)和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向社保基金注入更多现金流等措施,提高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力度,从而彰显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本质属性和国有经济在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上的主导作用。

三、城镇土地国有、保障房建设与共同富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存量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商品房的价格随之不断攀升。即使剔除泡沫因素,由市场决定的房价对于广大中低收入城镇居民也是难以承受的。目前,居民的财产,主要是房产的差距已很明显,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甚至出现了恶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财富呈严重的右偏分布,财富占有高度不均,收入最高10%家庭的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而大量低收入家庭储蓄很少。这就使得很多买得起房的城市家庭拥有不止一套住房,多余的住房主要用于投资甚至投机。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连购买一套自住房都十分困难,基本生活居住需求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解决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意义十分重大,要求也十分迫切。

为满足广大工薪阶层的基本生活住房需求,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启动了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工程。应该说,城镇土地国有为保障房建设奠定了制度优势,有助于满足低收入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一方面,土地国有为保障房建设用地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中央和各地政府相继采取了建立保障房用地储备、优先低价供给保障房用地等优惠政策和措施。例如,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2012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供地指标要从严从紧投放。耕地保护要严而又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保障性住房的用地要‘应保尽保’,计划指标单列”;2011年12月修订的《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办法》提出,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可以代表政府在土地市场上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土地纳入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

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是保障房建设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2011年,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000~1500亿元,占政府出资规模的约1/3。此外,有的地方还利用对公有土地的掌控,采取了其他一些促进保障房建设的措施。如2011年9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对云南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专题询问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罗应光指出,对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建设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经规划部门批准将原用途变更为住宅用地后,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

但仍需看到,我国城镇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压力依然较为紧张,城市生活的各种成本也在不断加大,人民生活的幸福感仍有待提升。为此,应大力推进对国有土地出让收益更加合理的使用,以满足保障房建设等民生事业的资金需求。

大部分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划归地方支配,其中有相当部分并未得到合理的使用。2010年审计署公布的对全国11个省区土地出让收入的审计结果显示,11个城市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用途57亿元,其中有7个市支出2.1亿元,用于弥补国土、城建等部门工作经费不足;有4个市违规支出2.38亿元,用于建设、购置办公楼、商务楼、职工住宅等;有6个市支出39亿元用于高校新校区、会展中心、剧院、软件园等公共工程建设;有4个市支出9.68亿元,用于增加政府投资企业注册资本。^⑩

目前,土地出让收入一个重要的、合理的利用途径,就是用以填补保障房建设的巨额资金缺口,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要。据估计,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约需资金1.3—1.4万亿,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约为2万亿元。保障房建设资金构成方面,政府出资约3500—4500亿,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030亿,地方土地出让金投入1000—1500亿,地方发债及其他途径筹措资金1500—2000亿,社会筹措资金约9000亿元,这一部分主要由银行信贷解决(中信证券研究部,2011)。可见,银行贷款和发债等融资占了绝大部分。这一方面增加了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给保障房建设进度带来了制约和隐忧;另一方面提高了建设成本,增加了购买者和租用者的负担。

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出让金只有不到10%用于保障房建设,仅占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的10%左右。如果能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房建设

的比例,将极大地缓解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压力。考虑到制度方面的原因,这一比例的提高可能是渐进的。一个过渡性的措施是,将划拨给保障房建设的土地的出让金优先用于投资回报风险较高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以满足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此外,可以考虑延期支付、乃至直接减免保障房建设所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以缓解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压力,降低建设成本。

从长远着眼,应改革现行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方向,提高用于保障房建设的比例,使人民群众作为国有土地的所有者,能够直接享受到国有土地财产的出让收益,而不是在购房置业的过程中被单向地抽取财富。这就需要对巨额土地出让收益的流向加强监管,避免国有财富用于行政滥消费和地方政府的工资福利超发,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以及不太急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唐伟、黄双江,2011),并公开必要的信息以便于社会监督。

注:

- ①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2011 年 11 月 9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30/n6971460/13225387.html>。
- ②相关数据来源于:《国企收益内部化知多少》,《网易解读》第 312 期。
- ③相关数据来源于:《国企收益内部化知多少》,《网易解读》第 312 期。
- ④参见《一方水虚报 3 毛 5?——一份供水成本监审报告揭示的秘密》,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6/26/c_112290860.htm。
- ⑤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公司,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股份数量的 10%,将股份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股权不足 10%或已经卖掉的则划拨现金。
- ⑥相关数据来自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11 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
- ⑦相关数据来自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第四届理事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戴相龙理事长的报告《稳中求进 总结提高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 ⑧相关数据来自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举办的 2012 年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的介绍。

- ⑨相关数据来自于《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⑩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领域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439 页。
- ⑪2011 年以来中央各部门陆续下发文件,要求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 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水利建设,加上 2004 年规定计提 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目前已有 45%的土地出让净收益被中央予以安排。

参考文献:

- Grossman, S. J. & O. D. Hart(1980), "Takeover bids, the free-rider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2—64.
- Hansen, R. S., R. Kumar & D. K. Shome(1994), "Dividend policy and corporate monitoring: Evidence from the regulated electric utility industry", *Financial Management* 23:16—22.
- Jensen, M. & W. Meckling(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360.
- Jensen, M. (1986),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s,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323—329.
- The World Bank(2012), *China 2030: Build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胡家勇 武鹏,2012,《推进由“先富”到“共富”的阶段性转换》,《经济学动态》第 12 期。
- 唐伟 黄双江,2011,《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重复建设问题分析》,《现代商贸工业》第 11 期。
-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 武鹏,2011,《行业垄断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 10 期。
- 武鹏,2012,《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当代经济研究》第 3 期。
- 郑晓波,2011,《豪掷 7000 多亿 百余家央企产业援疆》,《证券时报》8 月 22 日。
- 中信证券研究部,2011,《银行业专题研究报告: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研究》7 月 22 日。

(责任编辑:陈建青)